

清华大学文化素质教育丛书

16

昨夜星辰

中国古典诗歌品鉴

清华大学出版社

孙明君 编著

1207.227.2

587

112

(京)新登字 158 号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邮编 100084

<http://www.tup.tsinghua.edu.cn>

书 名 昨夜星辰——中国古典诗歌品鉴
作 者 孙明君 编著
印 刷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
发 行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850×1168 1/32 印张 6.875 字数 169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302-00780-2/I·28
印 数 0001~3000

定 价 13.00 元

总序

子曰：“君子不器。”

每一位不甘沦为工具的青年，都应该打开狭小的专业“囚笼”，究天人之际，探心灵宇宙，悟时代真理，会文理一身，使自己成为行走于天地之间大写的人。

走进清华和准备走进清华的青年，在这所历史悠久的名校里，除了要掌握服务社会、实现自我的一技之长外，还应该返回孔子、返回柏拉图，从几千年的文化经典中寻找自己安身立命的精神支点，这样才能在未来的社会里，真正地做到经世济民、兴业安邦。清华大学于1997年正式颁布了《清华大学学生应读书目》（人文部分），陆续开设了200余门人文与社会科学课，要求每一位理工科的学生至少修习四分之一的文科课程。如今，攻读人文经典，同古今中外的大师交流对话，已经在清华校园里蔚然成风。

强化文化素质教育，是一项伟大的变革，它势必提升清华的世界地位，影响中国的未来。

今日之清华，不仅是“理工重镇”，而且是“人文日新”。校内外

名师学者，在这里设坛授课，论究学理。本套丛书从中遴选精品公诸于世，希望有更多的青年获益并使这套丛书在公众的批评下日臻完善。

张岂之 徐葆耕

2002年2月2日于清华园

绪 论

古典诗歌的发展历程

古代诗歌具有超越时空的永恒魅力，它如同昨夜璀璨的星辰，在今夜、在明夜依然会熠熠生辉。在漫漫的人生旅途中，它像一泓清泉，使我们燥热的心灵感受清凉，给我们添加继续跋涉的力量；在喧嚣的世界里，它像一片绿荫，为我们疲惫的身心提供一处栖息之地。让我们暂时摆脱尘网的羁绊，陶醉在美的享受中吧。

古代诗歌源远流长，品类繁多，成就斐然。古代诗歌的流变历程，一般按照历史朝代的衍变，分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等不同的发展阶段。

（一）先秦两汉诗歌

先秦时代出现了中国诗歌的两大源头：《诗经》与《楚辞》。

《诗经》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原称为《诗》或《诗三百》，自从汉儒尊《诗》为经，后人递相沿袭，遂以《诗经》称之。《诗经》编成于春秋时代，其中包括西周初年（公元前 11 世纪）到春秋中期（公元前 7 世纪）大约 500 年间的诗歌创作，大部分是民间

歌谣,也有一部分出自于士大夫之手。《诗经》共收诗歌 305 篇。按音乐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郑樵云:“风土之音曰风,朝廷之音曰雅,宗庙之音曰颂。”(《通志序》)此亦为今日学界之共识。《风》指十五《国风》,它们是周南、召南、邶、鄘、卫、郑、齐、魏、唐、王、秦、陈、桧、曹、豳等 15 个诸侯国的民间歌曲,共 160 首。在这些诗篇中,“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表现了下层民众的生活、斗争和思想情感:有的反映了人民的觉醒与抗争;有的反映出战争、徭役给人民带来的苦难;有的描摹了社会的动乱和统治者荒淫无耻的生活;更多的是“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之作,为我们展现出先民丰富的情爱世界。《雅》诗是周王畿的乐歌,周人称这一地区为夏,夏雅通用,故称。《雅》共 105 篇,因产生的年代与乐调不同,分为大小雅。大雅 31 篇,小雅 74 篇,大雅多是西周时代的作品;小雅多作于周王室衰微之后。雅诗的内容主要有政治讽喻诗、周族史诗、婚姻爱情诗、农事诗、宴饮诗、颂德诗、贵族怨愤诗、反映民生疾苦诗等。与《国风》相较,《雅》诗反映的社会生活面更为广泛。《颂》诗共有 40 篇,包括《周颂》31 篇,《鲁颂》4 篇,《商颂》5 篇。大体上是祭歌、赞美诗,是统治者用于宗庙祭祀的乐章,旨在歌颂祖先的丰功伟绩和鬼神的巨大威灵。一般说来,颂诗的文学价值不太高,但有一定的史料价值。《诗经》的表现手法有“赋、比、兴”三种。“赋者,敷也,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朱熹《诗集传》)赋即是直接铺陈叙述;比是比喻,有明喻、隐喻之分;兴即起兴,有引起联想,烘托渲染气氛的作用。大抵《国风》多用比兴,《大雅》多用赋法。赋比兴手法的运用,使《诗经》具备了动人的艺术魅力。《诗经》主要采用四言诗和隔句用韵,但亦富于变化,其中有二言、三言、五言、六言、七言、八言的句式,显得灵活多样,读来错落有致。章法上具有重章叠句和反复咏唱的特点,大量使用了叠字、双声、叠韵词语,加强了语言的形象性和音乐性。《诗经》中的一些篇章

工于描写,勾画出许多生动的细节,《七月》写农家一年四季的生活,宛如一幅幅精美的民俗生活画。《诗经》是中国诗史的源头,它积淀了丰厚的上古文化内涵,具有不朽的诗史意义。开创了中国诗歌关怀现世、注重民生物疾苦、再现普通民众思想情感的诗歌之路;它的赋比兴手法更是后世诗歌艺术表现的基本法则。

《楚辞》原指楚人特有的诗歌形式,后来亦指西汉刘向汇集的一部以屈原作品为主体的诗歌总集。楚辞的特点是“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富有浓厚的楚国地方色彩。屈原是楚辞的代表作家,他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故后人又称“楚辞”为“骚”。屈原(前340年—前278年左右),名平,字原,战国楚人,我国诗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出身于楚国王族,有高度的修养和爱国情怀。“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楚怀王时,官至左徒,参与楚国内政外交大事。“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史记·屈原列传》)主张举贤授能,变法图强,遭到保守派的谗害排挤。怀王时曾被放逐于汉北一带;顷襄王时,第二次放逐,从此飘泊于江南。在长期的流放生涯中,他不改初衷,关怀人民,注视着故国政局的变化。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年),秦破郢都,楚王客死于秦,人民陷入国破家亡、流离失所之困境,屈原悲愤绝望,自投于汨罗江。据现代学者研究,屈原作品基本上可以肯定的有《离骚》、《九歌》、《九章》、《天问》、《招魂》等23篇。这些作品以其深邃的思想、卓越的艺术手法而享誉中国诗史。《离骚》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宏伟的长篇抒情诗,在诗中他回顾了自己的身世和参政历程,表达出献身理想的强烈愿望和不屈不挠与黑暗势力斗争的决心。全诗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九章》包括《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九篇作品,同《离骚》一样,诗人反复地抒写了自己的理想,揭露了楚国政治的黑暗。《九歌》是一组祠神诗,所祠之神有云中君、大司命、少司命、河伯、湘君、湘夫人、山鬼、

东皇太一及国殇(为国战死之神)等。屈原既保存了民间祭神歌辞的特点,也注入了自己的思想感情。《天问》是一首奇特的诗,诗人一口气提出了190个问题,对自然现象、历史故事、神话传说等发出了疑问,表现了诗人对宇宙、社会、人生的哲学思考。屈原作品在艺术形式和表现技巧上有独特的成就。他从楚国民间文学中吸取营养,创造了一种句法错落、灵活生动的骚体诗,它既是辞赋形式的先导,又是四言诗向五言诗过渡的津梁。楚辞发展了传统的比兴手法;使比兴能象征一个完整的艺术形象;众多的比喻构成了一个特定的系统;象征物与本体之间有一种相对稳定状态。屈原作品想像丰富,构思奇特,变化多端,热情奔放,雄奇瑰丽,具有浪漫主义色彩,是我国浪漫主义诗人之祖。屈原作品塑造出了一位顶天立地的抒情主人公形象,这是一位人格峻洁、感情充沛、志向远大的新人形象,他具有平治天下的历史使命感和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忧患意识。楚辞的语言绚烂华美,对偶工巧。屈原对后世的影响有两个方面:一是他深沉的爱国主义情怀和积极顽强的斗争精神给一切追求光明坚持正义的士人以精神上的感召力;二是他富有个性的作品与《诗经》一起成为我国诗史的两大源头,衣被了历代诗人。从此中国诗歌从集体歌唱走向个人独立创作的新时代。

两汉是一个诗思消歇的时代,文人创作的兴趣集中在汉赋方面。代表汉代诗歌水平的是汉乐府和《古诗十九首》。乐府的原义是官设的音乐机构,后来称此机构所收集、编制的歌诗为乐府。秦代已有乐府机构,大规模的搜集产生于民间的歌谣始于汉武帝时代。《汉书·艺文志》云:“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乐府继承了《诗经》的传统,广泛深入地反映了汉代的社会现实,其中有反映社会危机的诗篇,如《东门行》《悲歌》;有再现战争、徭役的诗篇,如《战城南》;有表现爱情世界的诗篇,如《上邪》《有所思》。

《陌上桑》讽刺了上层人物的轻薄，揭露出汉代官吏打着“循行属县”的招牌实际上扰民害民的历史真相。《陌上桑》写活了采桑女秦罗敷，在对罗敷之美的描写中通过美的效果来表现美。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反映了汉乐府的最高艺术成就，人物既有鲜明的形象，又有高度的典型意义。

五言诗最初发源于民间，因其在艺术上的优点，逐渐引起了文人的注意和模仿。四言两字一拍，四字一句，句式短，节拍单调，单音节词与双音节词的配合受限制，在韵律上呆板，不能表现抑扬顿挫之美。五言因其二三结构，即三字尾，在一句诗的节拍上起到了有偶、有奇，奇偶相配，有变化，不呆板，不单调的作用。东汉末年《古诗十九首》的出现标志着五言诗的成熟。《古诗十九首》最早见于萧统的《文选》。不是一人一时之作，产生的年代相去不远，大约出现于汉末桓灵之世。这组诗主要反映了社会中下层士人的思想和情感。其主题一是游子思妇的离别相思之情，二是仕途失意的苦闷。风格平易淡远，语言浅近自然，没有刻意雕饰的痕迹。《文心雕龙·明诗》许其为“五言之冠冕”；《诗品》称其“惊心动魄，一字千金。”

（二）魏晋南北朝诗歌

建安时代被学界誉为“文的自觉”的时代，“文艺复兴”的时代。这个时代诗人辈出，云蒸霞蔚，“彬彬之盛，大备于时”。其中最为杰出的当推曹氏父子，曹操诗歌或写民生疾苦，或抒一统天下之志，悲凉慷慨，刚健有力，气韵沉雄；曹丕“诗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沈德潜《古诗源》），其诗多写游子思妇之情，对人生进行哲学的思考；曹植前期纵情任性，风流不羁，后期名为藩王，实为囚徒。建功立业、名垂青史是他终生的追求。后期诗歌多表现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其诗“骨气奇高，辞采华茂”（钟嵘《诗品》）。围绕三曹父子，出现了建安七子和女诗人蔡文姬等诗人，形成了建安

风骨，诞生了中国诗史上第一个文人集团。建安诗人不仅坚持、深化了“诗言志”的传统，而且开启了“诗缘情”的大道。中国古代诗歌的主要题材类型在建安时代已经出现，并提升到了相当的高度。经过建安诗人特别是曹植的努力，奠定了五言诗在中国诗史上的地位。六朝时代存在着士庶文风、南北文风、天然文风与人巧文风的区别。士族文学以玄言诗、山水诗、咏物诗、宫体诗为主流，特立独行的庶族诗人如左思、陶渊明、鲍照等，纵然才情横溢，也只能徘徊于诗坛的边缘地带，无法进入核心领域。本期涌现了许多优秀的诗人，除上述三位外，还有阮籍、嵇康、陆机、刘琨、郭璞、大小谢、阴铿、何逊、庾信等等。咏怀诗、田园诗、山水诗、咏史诗、艳情诗等体类在本期发展到前无古人的高度，诗坛呈现出百花争艳的景象。阮籍本来有济世之志，因天下无道，名士难以保全生命，故遗落世事，惟求自保。《咏怀》八十二首主要表现生命的孤独苦闷，理想的难以寻求。诗中多用比兴手法，或以自然事物象征，或以历史、神话暗示，“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钟嵘《诗品》）。陶渊明的诗歌以表现隐逸思想和生活为主体。陶渊明描绘田园风光、表现田园生活之诗作的出现标志着田园诗的成熟。在这些诗歌中，有诗人对未来田园生活的展望；有对乡村风光的描绘；有力耕自养的欣喜；有与友人的欢聚，或饮酒，或赋诗；也有独处的乐趣；也有意与景会、心与道冥的忘我之境。其咏怀、咏史诗围绕仕与隐的矛盾，表现理想不能实现的苦闷。陶诗真淳自然，情景理合一，开创了新的审美领域和新的审美境界。谢灵运的山水诗带着孤清的情调，能够生动细致地描绘山水美景，给人以清新之感。鲍照诗侧重表现建功立业的抱负和对门阀制度的不满。诗风俊逸豪放，奇矫凌厉。永明诗人在声律上有了巨大的突破，“永明体”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内在音乐美的形成。庾信后期诗歌主要抒写自己身世遭遇，以及对故国的怀恋，风格苍凉萧瑟，集南北朝诗歌之大成。南北朝的民歌各有特色。南朝民歌多情歌，多女子之歌，情调哀怨。

缠绵，艳丽柔弱。多五言四句，双关谐音。《西洲曲》写女子从春到秋的相思，情意缠绵，清丽婉转。北朝民歌题材广泛，感情直率，语言朴实，风格刚健。《木兰辞》叙事与抒情相渗透，细腻与粗犷相溶合，代表了北朝民歌的最高成就。

（三）唐诗

唐诗是中国诗歌发展的峰巅，是一代文学的标志。

清人彭定求等所编《全唐诗》共收集有唐一代 2 200 余位诗人的 48 900 多首诗歌。唐诗的作者上有帝王将相、下有渔夫樵人、僧道伶工；唐代诗坛上不仅涌现了初唐四杰、陈子昂、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白居易、韩愈、孟郊、柳宗元、刘禹锡、李贺、李商隐、杜牧等璀璨的群星，而且升起了“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两位光耀千秋的诗坛巨星。唐诗在诗体上日臻完善，以五七言为主，四言、杂言的古体诗、乐府诗乃至律诗、绝句无不具备，许多诗人对近体诗体制的掌握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唐代诗歌流派众多，风格多样。著名诗派有山水田园派、边塞派、韩孟派、元白派等，风格上呈出雄浑、冲淡、纤秾、高古、典雅、洗练、劲健、绮丽、自然、含蓄、豪放、疏野、清奇、飘逸、旷达等多姿多态之景象；唐诗意象的选择、摄取极为广泛，举凡社会生活、人物内心世界无不涉及，真实记录了有唐一代的社会史实，表达了不同阶层人物的情感和愿望；唐诗以其意象的组合、意境的开拓，创造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最高审美境界，取得了后人难以逾越的艺术成就。

唐诗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动态的过程，明人高棅的《唐诗品汇》把唐诗分为初、盛、中、晚四个阶段，大体上是符合实际的。今日学界通行的四个阶段的划分是：初唐指高祖武德元年（618 年）至玄宗开元初（713 年），约 100 年；盛唐指玄宗开元初（713 年）至代宗大历元年（766 年），约 50 年；中唐指代宗大历元年（766 年）至文宗开成元年（836 年），约 70 年；晚唐指文宗开成元年（836 年）至昭宣

帝天祐四年(907年),约70年。

初唐时期诗坛主流沿袭了齐梁余风,题材狭窄,格调纤弱。王绩是当时有名的田园诗人,诗风淳朴淡远。沈佺期、宋之问在律诗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经过了长期的探索,律诗到了沈宋手中基本定型。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在诗歌革新方面各显实绩,对萎靡的诗风有所振起。稍后,陈子昂力倡汉魏风骨,诗歌关注广阔的社会生活和重大的政治问题,经过他和同时代诗人的共同努力,逐渐摈弃了轻浮绮靡的诗风,建立起高峻雄浑、刚健有力的新诗风。

盛唐时代名家比肩接踵,诗歌创作如日中天,形成了令后人追慕不已的盛唐气象。李白和杜甫如同中国诗史的双子星座闪耀在盛唐的天幕上。李白是唐帝国国力鼎盛时期的青春歌手,杜甫是大厦将倾之际的忧患诗人;李白诗歌是盛世之音,杜甫诗歌是乱世之曲;李白诗歌飘逸豪放,杜甫诗歌沉郁顿挫。李白时而高歌理想,充满自信,慷慨激昂,时而悲叹不幸,颓唐消沉,其诗歌的主旋律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是个性、自由与社会制度的冲突。李白诗中的形象往往是个性化的,带有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他以天真烂漫的眼光看待世界,他笔下的现实是一种经过了个性化处理的意象世界,通常带有神话、梦境、幻景成分。其想像力独特而神奇,语言清新而自然。杜甫以冷静理智的目光审视世界,对时代、对民族、对国家、对天下充满了忧患意识,他的“诗史”之作达到了反映社会现实类诗歌的最高水平。同时杜甫的仁者心投射向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各个层面。杜甫善于对现实生活作高度的艺术概括,创造出雄浑壮阔的艺术境界。其语言千锤百炼、苍劲精密。杜甫众体兼长,是写作七律的第一大家,他的七律数量超过了初盛唐诗人七律的总和。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田园山水诗派和高适、岑参为代表的边塞诗派将盛唐诗坛装扮得千姿百态、气象万千。王维的山水田园诗将诗情、画意、音乐美与道家、禅宗的意趣

结合起来,诗中有画,诗中有乐,诗中有禅,形成一种洁静明秀之美,达到了诗歌创作的最高境界——无我之境。边塞诗人既热烈地歌颂将士建功立业的报国情怀,反映出昂扬向上的时代精神,也描绘了战争的残酷和对人民造成的灾难。岑参的边塞诗还描绘了边疆地区诡奇壮丽的自然风光。

大历年间诗歌创作跌入低谷,大历十才子之诗缺乏雄浑之气。中唐后期诗坛再度辉煌,元白等人掀起了写作新乐府的潮流。张籍、王建倡之于前,元稹、白居易应之于后。白居易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他的《新乐府》和《秦中吟》就是这一理论主张的实践,广泛反映了社会弊端,语言通俗流畅。白居易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当推《长恨歌》与《琵琶行》。韩孟诗派喜欢通过抒写个人的不幸遭遇来揭示社会弊病,在艺术手法上刻意求新,追求险怪生涩的诗风,语言方面务去陈言,炼奇字,押险韵,造拗句,乃至以散文句法入诗。柳宗元、刘禹锡、李贺等杰出的诗人无不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柳宗元的诗歌多抒发个人离乡去国之悲愤抑郁。其山水诗简洁深婉,自成一家;刘禹锡的怀古诗和政治讽刺诗语言平易,感情深厚,寓意深远;李贺诗歌重在诉说怀才不遇的悲愤,想像奇特,构思不拘常法,语言峭奇。晚唐时期大唐帝国日薄西山,气息奄奄,诗歌创作亦如同返景入林之残照。李商隐、杜牧为唐诗抹上了最后一层辉煌。杜牧咏史诗议论政治得失,讽刺帝王荒淫。咏怀诗感慨人生,描写自己的放浪生活。李商隐的政治诗多借咏史的面目出现,批判统治者。爱情诗深情绵邈,悱恻柔腻,隐晦曲折,凄艳迷离,怅惘哀伤。艺术上他大量运用神话、典故,情景刻画细致入微。他的诗有高度的语言美和声韵美。晚唐后期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罗隐、陆龟蒙等人,继承了白居易新乐府的传统,大胆揭露社会现实。司空图、韦庄等人追念往日的繁华,伤悼眼前的动乱,流露出浓厚的末世情调。

(四) 宋诗

唐宋以降，学界有尊唐与崇宋的两大派别，推崇宋诗者认为宋诗与唐诗双峰并峙，各有千秋。“宋人之诗变化于唐，而出其所自得，皮毛落尽，精神独存。”（吴之振《宋诗钞》）贬斥宋诗者认为宋人把诗歌创作引向歧途，味同嚼蜡。在某些时期，“苟称其人之诗为宋诗，无异唾骂。”（叶燮《原诗》）不管后人怎么看，宋诗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面貌。宋诗的特色正如严羽《沧浪诗话》所云：“国初之诗尚沿袭唐人。……至东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

宋初诗人承续中晚唐诗风，西昆体诗人模仿李商隐，音节铿锵，辞采精丽，喜用典故。宋仁宗后，欧阳修领导了诗文革新运动，宋诗逐步走向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苏舜卿、梅尧臣是受到欧阳修推重的两位诗人，“（苏）子美笔力豪隽，以超迈横绝为奇；（梅）圣俞覃思精微，以深远闲淡为意。”（欧阳修《六一诗话》）王安石诗歌学习杜甫，表现出诗人要求改革时弊和关心民生疾苦的精神。其咏史诗在宋人中造诣最高。晚年诗作精丽深婉，妥帖自然，寓悲慨于恬淡之中。苏轼一向被推为宋代最伟大的文人，在诗、词、文方面都有巨大的建树。朱自清先生说：“子瞻诗气象宏阔，铺叙婉转，子美之后，一人而已。”（朱自清《宋五家诗钞》）其诗题材丰富，立意新颖，诗思敏捷，奔放灵动，笔力豪健。各体兼长，尤长于古体和七言歌行。南宋初年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首列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三人，以下还有二十余人。江西诗派之名从此确立。其共同特点是：以故为新，讲求点铁成金，夺胎换骨，以学问为诗，去摹古、变古，追求奇险硬涩的诗风。杨万里的诚斋体师法造化，恢复耳目观感的天真状态，构思新颖奇特，笔调幽默诙谐，语言通俗明白，风格爽朗轻快。范成大诗风轻巧婉

丽，温润精雅，他的田园诗不同于一般文人士大夫的远眺式描写，他能够深入乡村，写出立体的带有泥土和血汗的田园诗。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陆游留下了万首诗篇。内容涉及南宋前期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特别突出的是反映了当时的民族矛盾，作品洋溢着收复失地，统一中原的愿望，充满了请缨无路、壮志难酬的悲愤。南宋末年，永嘉四灵（徐玑、徐照、翁卷、赵师秀）学习晚唐诗人姚合、贾岛，专攻近体，尤其是五律，刻意在炼句炼字上下功夫。江湖派以戴复古、刘克庄为代表，他们多是在野诗人，提倡一种清新尖丽的诗风。文天祥的诗歌直抒胸臆，慷慨悲壮。

（五）元明清诗歌

元代文学是中国文学的转型期。戏曲小说取代了诗词，占据了文坛的重要位置。元初诗歌北方诗人受元好问影响较大。南方继续着江湖诗派的诗风，以戴表元、张炎较为重要。后期著名诗人有虞集、范椁、揭傒斯、杨载等。元诗喜学唐人，开明代拟唐诗之先河。

明代诗文流派众多，但没有出现可以与唐宋匹敌的大家。明初诗人高启强调诗歌的格调、情感、旨趣，力图摆脱理学家对诗歌的束缚。永乐年间，出现了以杨士奇、杨荣、杨溥为代表的“台阁体”，思想情感雅正平和，有浓厚的道学气。弘治、正德年间的前七子（李梦阳、何景明等）与嘉靖、万历年间的后七子（李攀龙、王世贞等）发起了复古运动，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反对台阁体文风。万历时，公安三袁（袁宗道、宏道、中道）提出“性灵说”，要求诗人保持人性的纯真与活泼，表现个人的独特创造。湖北的竟陵派（钟惺、谭元春）主张与公安派相近，旨在标新立异，形成了幽深孤峭的诗风。

清代诗歌出现了众多的流派，如王士禛的神韵派，查慎行的宋诗派，沈德潜的格调派，翁方纲的肌理派。清诗不满于明诗的一味

模仿,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综合唐宋诗,较明诗显得自然,有一定创造力。清初江左三大家指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钱氏提倡宋诗,反对复古,要求诗歌抒发真性情。康熙诗坛领袖王士禛论诗以“神韵”为宗,强调自然兴会,空灵含蓄,不拘形迹,天然凑泊,冲淡闲远,具备风神、韵味之美。其作笔力嫌弱,用典太多。清代中叶,沈德潜认为诗歌应该“和性情,厚人伦,匡政治”,“温柔敦厚”,在艺术上讲究比兴,含蓄蕴藉,反对质实,重视格调声律。其诗平正而有情韵。袁枚主张写诗表达性灵,写真情实感,其诗清淡灵巧。翁方纲论诗歌主张“以肌理为准”。肌理即指学问材料。他要求把义理(思想)、文理(结构)和肌理(学问材料)结合起来。他所代表的是考据学影响下产生的一个诗派。晚清诗人龚自珍的诗歌自觉反映时代精神,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形成了奇丽非凡、纵横浩博的风格,打破了清中叶以来诗坛长期沉寂的局面。

目 录

绪论 古典诗歌的发展历程 V

上篇 天间情爱

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爱情诗 1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友情诗 26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亲情诗 51

中篇 情系社会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咏怀诗 67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时事诗 95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咏史诗 115

下篇 走进自然

何必竹与丝,山水有清音——山水诗 134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田园诗 161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咏物诗 180